

从我视角分析中国古代如何孕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郑 红¹, 汪凤炎^{1,2}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2. 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 南京 210097)

摘 要: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看,认同中华文化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必要条件。形成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大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条件。从自我发展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个体自我从小我向大我的发展过程。基于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个体若过度沉迷于小我,不识大体,就可能成为其拓展至大我的重要障碍。如何引导个体在适当时机突破自我认知局限,发展出具有更广阔空间的大我?从心理学视角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对祖国的归属感”外,至少还有“形成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培育家国情怀法”和“提升人生境界法”等三种有效方法。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认同;小我;大我;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5)01-0003-08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这是近代较早使用该概念的文献之一。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里,从历史演变角度剖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最后得出结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这表明,梁启超于1905年首用“中华民族”一词指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体多元的自觉的民族实体,包括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陈至立,2019, p. 5739)。“中华民族”一词出现的时间虽晚,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华夏大地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与交融汇聚已存在数千年之久,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格局(费孝通,1989)**。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首次将“中华民族”写入宪法。2014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4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系统阐释和部署。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自2014年5月底起,在学术界逐渐掀起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潮。

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对2014~2025年1月中国知网上的文献进行检索,共找到14898篇文章,其中,学术期刊论文1.08万篇,图书14部,学位论文1033篇,报纸文章1734篇,会议论文397篇。概括起来,学界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科视角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同时,学界探讨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十大路径,包括历史路径、当代路径、经济路径、法治路径、思想路径、文化路径、心理路径、社会路径、制度路径和专政路径(黄明涛,刘燕,2023)。从心理学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大优点是方法规范科学,所获成果主要有四个贡献:(1)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了界定(管健,杭宁,2021),编制出了信效度较好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量表》(陈立鹏,薛璐璐,2021);(2)通过严谨实验设计,考察了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群际态度和助人倾向(孟乐等,2022);(3)参照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机制(管健,荣杨,2020);(4)从中华文化认同入手,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管健,方航,2020)。不过,因种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曾一味紧跟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

*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1JZD063)。

通信作者:汪凤炎, E-mail: fywangjx8069@163.com。

** 费孝通原文的表述是“多元一体”,笔者将之改作“一体多元”。因为“一体多元”优先突显“一体”的重要性,这比优先强调“多元”更合理。

不关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逐渐形成了一个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导致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法为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思想源泉、灵感和文化心理根基(汪风炎,2017),同时,过于以实证方法尤其是实验法为中心,颇为忽视理论建构。这两个“老毛病”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从心理学视角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某些成果里。结果,现有一些心理学研究成果往往缺少厚重的中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心理根基、缺少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内在逻辑。《管子·形势》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由此可知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尝试挖掘中国古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功经验,做到古为今用。

1 认同中华文化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必要条件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2011, pp. 7-8)说,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思维意识必须以符号为媒介,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是“符号共同体”。可见,中华文化符号的形成及其意义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根基,中华各族成员正是在基于共享文化符号意义基础上产生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才逐渐生出中国心,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遭遇外族入侵和内部社会动乱,但这些都未能阻碍中华各族人民做中国人的决心,未能阻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其中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有一套相对稳固的符号意义体系(如儒学和道学等),这套符号意义体系是中华民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动以及文明秩序建构的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凝结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思维方式、核心价值观和重要审美观念,蕴含中华民族群体共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审美理念(冯月季,石刚,2021)。这表明,“坚持文化认同是最深层的认同”。中华文化认同是指个体认同中华文化,它体现为个体在认知上了解和接纳中华文化(认知认同)、在情感上喜爱中华文化(情感认同)、在行为上自然地展现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或属性(行为认同)三个维度上。这样,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中华各族人民一旦认同、共享了中华文化,以文增“知”,以文育“情”,以文培“意”,以文助“行”,最终达到以文化人(苏德,王甜,2024),自然有助于他们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过,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看,在历史上,别的国家的民族(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等)也曾高度认同中华文化,但由于政治、历史和地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认同伟大祖国中国,不会生出中国心*,自然也不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不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而是形成了别的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如日本民族共同体)。当代西方也存在类似情况。如当代西方人可能多认同古希腊文化的思想价值,但由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主要基于近代政治、历史和地缘等多种因素,这种文化认同并未转化为政治和心理上的“希腊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不会生出希腊心,自然不会形成希腊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是形成各自国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表明,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多种条件,认同中华文化只是其中的条件之一,二者之间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从逻辑上讲,认同中华文化仅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无之必不能,有之未必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化具有共享性。如人们常说“东亚儒学文化圈”,就表明东亚人民共享了儒学文化。中华文化既然优秀,自然既能被中华各族人民所共享,也能被他国民族的人民所共享。所以,不认同中华文化,肯定无法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只认同中华文化,也不一定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毕竟“认同”只停留在认知层次,认同者一旦采取心理区隔策略(compartmentalization),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严格限制在文化认同层面,这种情形让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会生出中国心。只有在认同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国的认同,才能生出中国心而不是异心(如它国心),即生出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大我,这才是在意识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体层面形成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键。

可见,运用心理学视角,从“中华文化认同”入手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切实可行,却千万不能忘了临门一脚的关键功夫,即须加上“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国的认同”以“生出中国心”这个要件。中国先哲早就认清了这个道理。因此,在古代中国,主要是基于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而非血统来定义华人或华夏族:凡是认同中华文化(文化认同)且认同伟大祖国中国(国家认同),从而生出中国心的人都属华人或华夏族,反之,即便是中原土生土长的人,若最终不认同中华文化,或只认同中华文化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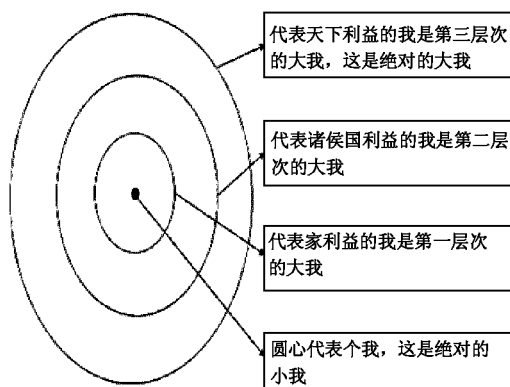
* 根据考古发现,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一词铸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上。“中国”以非正式国名与异域外邦相对称,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汉唐时期也有以“中国”为世界诸国并列一员的用法,如《后汉书》以“中国”与“天竺”(印度)并称,《唐会要》以“中国”与“波斯”“大秦”(罗马)并称。但这种用例在当时并不多见。“中国”作为国名是近代才确定下来的(冯天瑜,聂长顺,2021, pp. 45-71)。相应地,“中国心”是近代才逐渐流行的说法。中国古代是朝代国家,当时的说法基本都是与当时的朝代名相吻合的。如在汉朝,就说“汉人心”。依此类推。

不认同伟大祖国中国,未生出中国心的人就不属华人或华夏族。

2 形成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大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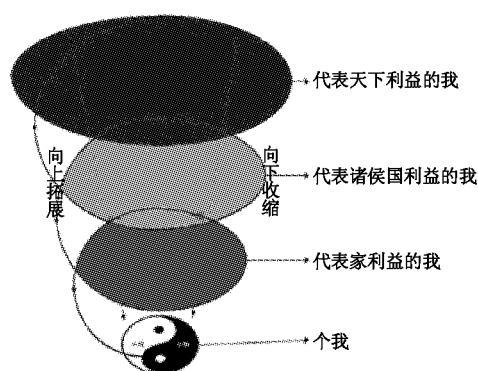
界定小我与大我的角度有二:一是从自我形象的大小上进行界定,二是从自我边界的大小上进行界定。从自我边界的大小角度讲,大我实指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自我,小我实指代表少数人乃至个人利益的自我。并且,大我和小我的内容都可以变化,即,随着小我内容的变化,大我内容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反之亦然。

据《孝经·谏净章》记载:“子曰:‘……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由此可知,儒家《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路径中,“天下”指“中国”;



左图 古代中国人自我的平面模型图

“国”指诸侯国;“家”的原型是大夫的“家”,即大夫的封地,类似于“三家分晋”中的“家”,而非指“士”及以下阶层的人所拥有的家庭和家族。结果,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深刻影响,古代中国人的自我主要是一个四层式同心圆结构:圆心指个我或小己(杨中芳,2001,p. 367),它是绝对小我,圆心外面第一个圆圈指代表大夫家(实为大夫的封地)利益的我,圆心外面第二个圆圈指代表诸侯国利益的我,圆心最外面的圆圈指代表天下(即中国)利益的我(类似今人所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是绝对大我,位于绝对小我与绝对大我之间的其他两种自我的地位是相对的:若向里看,与里面一个自我相比,它是大我;若向外看,与外面一个自我相比,它是小我(如图1所示)(汪凤炎,2023)。



右图 古代中国人自我的立体模型图

图1 古代受儒学影响的中国人的自我结构示意图(汪凤炎,2023)

比较可知,古今中国人的自我主要有三种变化:(1)国与天下的含义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中国人心中的“国”指诸侯国,“天下”指“中国”;在当代中国,“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天下”指世界各国。相应地,当代中国人心中“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我”实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我”实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家”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在古代中国,“齐家”中的“家”的原型是大夫的“家”,即大夫的封地;在当代中国,“家”主要指个体所在的家庭和家族,其中,“核心家庭”一般只涉及有二至三代直系血缘关系的亲人及其爱人,“家族”是由2个以上的核心家庭所组成,其成员除因联姻而加入的外,其余成员之间均存在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且源自同一祖宗。(3)二者的层数有变化。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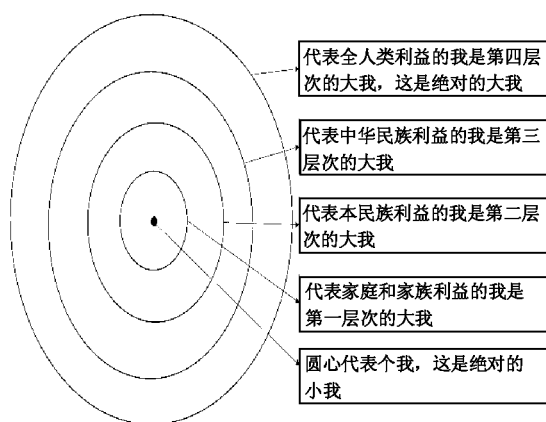
古代中国人的自我模型图一般只有4层。现代中国人自我模型的层数要多得多,若画一个简图,至少有五层(如图2)所示。

从中式自我角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是大我意识,它与中国古人心中“代表天下利益的我”名异实同。在古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体自我的发展过程,即中华各族民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是中华基本思维方式、核心价值观和重要审美理念——的长期熏陶下(汪凤炎,2019,p. 157),逐渐去自我中心化,接着遵循内外有别、上下有序的立体差序格局思想(费孝通,1998,pp. 26-28),*使其自我先是从个我中走出来,认同家人,形成代表家庭和家族利益的大我,接着,再从家庭和家族中走出来,形成代表本民族利益的大我,随后,再从本民族利益中走出来,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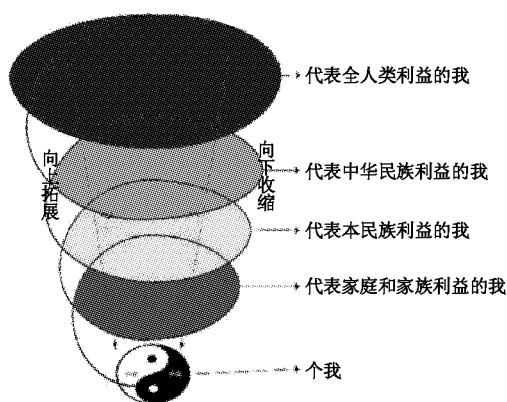
*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描述的“差序格局”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平面式差序格局,但中国古人所讲的差序格局实是“内外有别,上下有序”的立体式差序格局。

成代表天下利益的大我。个体一旦形成了稳定的代表天下利益的大我,就意味着其形成了稳定的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左图 当代中国人自我的平面模型简图



右图 当代中国人自我的立体模型简图

图2 当代中国人的自我模型简图(汪风炎,2023)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国先贤倡导的“代表天下利益的我”名异实同,故形成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大我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充要条件。一旦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宏大概念与自我联系起来,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就转换成一个纯粹的心理学问题,即探讨个体自小我(含个我)向大我转换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和促进措施。此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就不但吻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且拥有了厚重的中华文化历史根基。

3 从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看个体从小我拓展成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大我的障碍与对策

既然个体在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下,经由对中华文化由表至里、由浅至深的认同,进而形成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从形成个我意识、家庭与家族意识、本民族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渐次放大过程,实际上就是个体自我从小我向大我的发展过程,这样,基于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就能清楚地看清个体从小我拓展成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大我的障碍,并提出相应的破解对策。

3.1 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

儒家自我是一种以阴阳思维为根隐喻(root metaphor)(Anagarika,1981)的自我太极模型。若将太极图中的阴和阳分别代表小我和大我,就生出了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如图3所示):外面代表“太极”的最大圆指儒家自我;因为小我比大我相对黑暗(更易自私),故用“阴”(黑色)表示小我;因为大我比小我相对明亮(更易亲社会),故用“阳”(白色)表示大我;“黑中白点”暗示小我里蕴含大我的种子,即天理或孟子所说的善端,故个体通过持久的

修身养性便能不断成全大我;“白中黑点”暗示大我里潜藏小我的种子,即人欲或荀子所说的恶端,所以,个体的品行若未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圣人境界时就放弃继续修行的念头,一旦放松警惕,只要一遇不良道德情境,就易心生恶念,心生恶念后若不能及时消除,就极有可能使其自我倒退,大我就变小我了。儒家自我太极模型里的小我与大我双方相互对应,互为参照,它们虽能各自独立存在,却无法彻底分离,因为彼此相互包含;与此同时,小我与大我之间也是此消彼长、此长彼消,不过,双方虽能相互转化,却只能是部分转化,并且是有条件的,双方永远共存,一方无法彻底扬弃或消灭另一方(李平,2014,pp.246-248)。这意味着,即便极端自私乃至万恶之徒,其心中仍潜藏大我的种子,才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可能;即便是圣人,其心中也仍有小我的种子,只不过圣人将其收拾得非常好,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若是君子,一旦不洁身自爱,仍有成魔的可能。大我一旦达到代表天下利益的我,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Wang, Wang, & Wang,2019;汪风炎,2022)。

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暗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观。以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为内核,就能生出“自我圆融说”,它的要义是:每个人虽只有一个自我,但自我中有大小我之分,犹如太极图内的阴与阳一般,并且,二者的关系是此消彼长,此长彼消,通过持久的心性修养,使小我变得越来越小(最终小至一个黑点,却无法消亡),大我变得越来越大(绝对大我是民胞物与式自我),并让它们相互和谐、圆融,就能不断提升自我,当自我提升到一定境界后便能发展出成熟自我乃至圆融式自我,此时,他就能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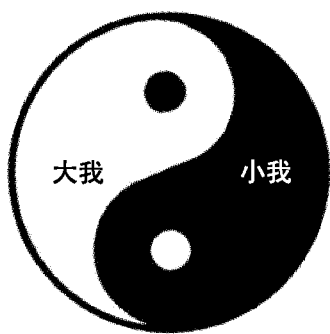


图3 儒家自我的太极图模型示意图

(Wang, Wang, & Wang, 2019)

到万事圆融(安乐哲,2006)。事实上,儒家以及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人的自我修养过程正是有意或无意地按自我圆融说进行的(汪凤炎,2022)。中国人从大我角度更容易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这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中华文化心理基础。

3.2 阻碍个体从小我拓展成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大我的因素及破解对策

根据儒家自我的太极模型,小我和大我有各自的价值。《孟子·尽心上》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个体不得志(包括财穷和势穷等)时,肯定洁身自好式小我的价值,当个体发达时,鼓励个体追求大我的价值,这合情合理。在儒家和深受儒学影响的人看来,对已具中国心的中华各民族而言,个体若脱离具体情境,过度沉迷于小我,不识大体,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巨大障碍,也是一些社会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让个体适时走出小我这一方寸之地,发展出具有更广阔空间的大我,既有利于减少人际疏离乃至人际和群际冲突,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中华民族的每位成员逐渐养成“小我只有拓展成大我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的理念,更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设。当然,若要引导个体走出小我舒适区,将他人与他物尤其是陌生的他人与他物纳入自我之中,最终形成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大我,关键是要打破小我的藩篱。如何打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采用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加以推进,包括法律层面的、社会治理层面的、经济层面的、教育层面的,等等。从心理学视角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国的认同”外,至少还有三种引导个体适时走出小我舒适区、成就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大我的有效做法:

(1) 让个体改变认知,超越族群认同,达到民族认同

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

1906年在《民俗论》(Folkways)一书中首次提出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的概念:前者是指由“我们的人”所组成的、能让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群体;后者泛指内群体以外的所有群体,它无法让人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Tajfel对内群体认同的研究最具影响力。Tajfel将内群体认同定义为,个体在意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社会群体时所感受到的情感与价值体验。当个体在一个群体中获得成员身份后,无论其身份真实与否,他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所属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相比较,并对自己所属群体产生积极的认同,给予群体内成员更多的资源与正面评价(Tajfel et al., 1971)。

分类是人类的独特偏好,分类帮助人们了解事物,有利于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在人际认知中,分类在赋予个体群体归属感的同时,也易成为群际偏见的主要线索。内、外群体是在一定分类下的相对概念,对内群体的归属与认同亦是多层次的。Gaertner和Dovidio等认为,当成员将身份的认知表征从两个群体转变为一个群体时,可以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和冲突。根据这一假设,他们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来考察群体再分类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以社会分类理论为视角,通过扩大感知到的群际边界,将原先的内群体(“我们”)、外群体(“他们”)归属到一个包容水平更广泛的上位共同内群体(更广泛的“我们”),使内群体偏好延伸至上位群体中先前的外部成员,对其产生积极的评价以调整对外群体的态度与行为。该认同过程主要包含诱发因素、中介表征及结果变量三个环节(Gaertner et al., 1993)。根据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中华各族人民通过共同内群体认同,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心理认同基础,即,如果将共同体的边界泛化到整个中华民族,就成为中华民族认同,即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管健,荣杨,2020)。

尽管“我们”和“他们”的界限是极其随意且模糊的,但找同伴,区分“我们”(即内群体,用“我们”来称呼)和“他们”(即外群体,用“他们”来称呼),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们”与“他们”,以加强自我认同,这几乎是群居动物的本能或似本能。群体内部的成员会互相模仿,但他们会刻意寻找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差异。人类既会高估群体内部的一致性,也会高估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亨廷顿,1998, pp. 133 - 135;何帆,2018, pp. 95 - 98)。这样,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常用方法是改变认知,让个体超越族群认同,达到民族认同。如何实现?参照点一变,认知就变。以老乡为例,如果你家在县城:当

你到省城读书时,来自同一县的同学都是你的老乡;当你到首都北京读书时,来自同一省的同学都是你的老乡;当你飘洋过海到大洋彼岸的外国读书时,来自中国的同学都是你的老乡……

中国先哲清楚认识到“参照点一变,认知就变”的道理,相应地,一方面,他们通过舆论宣传和教育等方式让民众知晓国有外患,就能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彻底放下小我,超越族群认同,达到民族认同,*进而认同和践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便是《孟子·告子下》所讲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道理所在。另一方面,中国古人恰当运用历史资料(这是中国历代重视修史的原因之一)、教育和文学作品等方式,让中国各族人民清楚认识到不团结就易被外人欺负的事实,自然有助于他们超越族群认同,形成国家认同,自然有助于他们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管健,荣杨,2020)。

(2) 培育家国情怀法

“共同体”是指特定群体在某个地域单位上的聚合。它既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家庭、社区、村庄或城市,作为社会和政治意义上的集体组织,共同体也指建立于共同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等基础上的地域性社群(陈美萍,2009)。共同体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的呈现。正如滕尼斯(1999, p. 15)所说:“关系是群体的聚合,也是一种心灵和生活意义上的群体联结过程,这是共同体的精髓所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最早、最小、最基本的共同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家与国具有同构性,人们常用“大家庭”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来形容中华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亲情共同体,即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郝时远,2020),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大家”与每个人的“家庭”这个小家是异质同构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正由于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家的隐喻呈现在个体与民族、国家的统一关系中,对家的体认唤醒了最深沉的民族记忆(黎朝辉,赵曼,2022)。因此,中国古人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可以从培育家国情怀入手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如何从培育家国情怀入手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概念,其特点体现在横向的“广”和纵向的“久”。横向的“广”是指家庭成员的广泛性。中国传统的“家”不仅包括夫妇二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及

其所生的子女乃至其儿孙所生的子女,还包括丈夫的兄弟、叔伯、侄子等已婚和未婚的家庭成员,形成一个层级分明、庞大复杂的家庭结构;再往广处扩展,甚至包括整个中华民族。因此,中国人讲的“光宗耀祖”,从小处讲,指能让自己一姓的祖先增光;就大处言,能让中华民族的祖先增光。纵向的“久”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时间长度。中国传统的“家”不仅是指现世活着的家庭成员的集合,还包含了历代已逝的祖先和未来尚未诞生的后代,成为一个连贯古今与未来的连续体(郭斯萍,2024)。同时,家的完整含义是实物层面的家、人员构成意义上的家、居住地层面的家三者的完美融合:(1)实物层面的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如果没有共同居住在同一个房屋里,则家的意义与功能会下降,甚至会逐渐丧失(毕恒达,2000)。并且,实物层面的家一般是指自己(自家)拥有产权的房子,而不能仅是租来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常常无法给人带来家的安全感和归属感。(2)人员构成意义上的家。从小处讲,它主要指自己的家人或家庭成员;从大处讲,它甚至包括整个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亲相爱,相互为对方营造浓浓亲情,这样才能让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以对方作为寄托自己心灵的居所或港湾,此时“家”才能给人归属感、安全感、信任感和舒适感。反之,即便同住一屋,若家庭成员之间闹矛盾,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甚至反目成仇,则无法让人产生家的感觉。(3)居住地层面的家。它主要指自己的家乡或故乡,只要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家乡有时是可随人而走的,正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语出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在家的上述三种含义里,第二种含义处于核心位置(毕恒达,2000)。这样,首先,通过适当的祖先崇拜,包括崇拜自己一姓的祖先和崇拜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可增强族群和社会凝聚力,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礼记·祭统》说:“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这是说,尊敬地祭祀宗庙社稷,则子孙孝顺。竭尽祭祀之礼,端正祭祀之义,自然就产生了教化的效果。可见,通过祭祀祖先,实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道德教化,自然能让民风向善。并且,祭祀祖先也让家族成员和中华各族成员在精神上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可加强家族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稳定,巩固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进而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这种以家

* 在中国,“民族”的含义有两种:(1)“指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如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2)指国家层面的民族之下的族裔共同体,如中国的汉、满等56个民族。”(陈至立,2019, p. 3054)。这里讲的“民族认同”中的“民族”用的是第一种含义,而非第二种含义。

庭、家族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体系,通过对祖先的敬仰,强调家庭成员和中华各族成员在“小家”(指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和“大家”(指中国)中的责任和社会义务,不仅规范了家庭成员和中华各族成员的个人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也为家庭成员和中华各族成员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发挥了类似宗教的作用(郭斯萍,2024)。所以,梁漱溟曾说:“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西方式的宗教,是因为以家为核心的伦理体系已经能够替代宗教的功能。”(梁漱溟,2005,pp.78-79)其次,努力让每位中国人早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有“安身”之所,与此同时,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孝道”“家规”“家训”“家教”的文化,使“父慈子孝”成为亲子之间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让浓浓亲情回归到每个家庭中,使每一位中国人都有一个温馨、安全、幸福的小家,他们才能切身体验到“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样,建立在和谐家庭、家族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容易形成。第三,中国人相信家国同构、家国一体,这样,除了从“家”入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外,先哲也认识到可采取多种方式提升个体的国家意识,用以铸牢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通过兴办官学和私学,向个体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个体普及通用语言、通用文字,通过个体对通用语言、通用文字的认同来提升个体的国家意识,用以铸牢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经由全国经济一体化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通过鼓励全国各族人民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共同奋斗、共同抵御外敌的途径来培育个体的大我意识。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助于提升个体的国家意识,增进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提升人生境界法

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在《梁惠王上》里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九渊说:“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陆九渊,1980,p.273)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曾撰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觉民在《与妻书》里写道:“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一个人所处的人生境

界太低,犹如人在山谷,高度不够,鼠目寸光,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大事看不清,中事看不透,纠结的多是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从而易因小失大,易只顾小家,却不顾大家。一个人的人生境界够高,犹如人在山顶,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自然易看透人间千奇百怪,不被其迷;格局大,就会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利益,不计较自己的小得失,不在乎短期的盈与亏,这种人才会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家。个体只要像孔子等人那样持有正确的义利观、荣辱观和高水平自律型软角色责任心(汪凤炎,郑红,2013),就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自然能从个我(又称小己,与独立自我类似)出发,通过持久的自我心性修养,不断扩展大我的边界,自我范围一圈圈扩大,就意味着做人境界的不断提高,自我就从个我发展至代表家庭家族利益的自我、再至代表本单位利益的自我、再至代表本民族利益的自我,再至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自我,最终升华至代表全人类利益的自我(汪凤炎,2023)。

参考文献

- [美]安乐哲(Roger T. Ames).(2006).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彭国翔编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1).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998).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 斐迪南·滕尼斯.(1999).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毕恒达.(2000).家的意义.应用心理研究,(8),53-169.
- 陈立鹏,马悦.(202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推进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4(6),30-41,181-182.
- 陈美萍.(2009).共同体(Community):一个社会学话语的演变.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18-123.
- 陈至立.(2019).辞海(第七版彩图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19.
- 冯天瑜,聂长顺.(2021).三十个关键词的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冯月季,石刚.(202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思想战线,(5),1-9.
- 管健,方航.(2020).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面向与心理路径.西北民族研究,(4),17-21.
- 管健,杭宁.(2021).知情意行:四维一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53-67.

- 管健,荣杨.(2020).共同内群体认同:建构拍摄水平更高的上位认同.《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57(1),39-49.
- 郭斯萍.(2024).精神自觉:文化转型下中国人自我困境的突破.《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5),58-66.
- 郝时远.(2020).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1-10.
- 何帆.(2018).《大局观:真实世界中的经济学思维》.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黄明涛,刘燕.(202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十大方法与路径: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述评.《云南行政学院学报》,(1),17-31.
- 黎朝辉,赵曼.(2022).脱嵌与再嵌:家文化的复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广西民族研究》,(5),79-86.
- 李平.(2014).中国智慧哲学与中庸之道研究.载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八辑)》(pp.237-25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梁漱溟.(2005).《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 [宋]陆九渊.(1980).《陆九渊集(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 孟乐,叶灿,王佳佳,张积家.(2022).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群际态度和助人倾向.《心理学报》,(11),1366-1380.
- 苏德,王甜.(2024).“以文化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意义及路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1),62-76, 172.
- 汪凤炎.(2017).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126-133.
- 汪凤炎.(2019).《中国文化心理学新论(上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汪凤炎.(2022).自我的太极模型:提出背景与核心观点.《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53-64.
- 汪凤炎.(2023).关于自我的太极模型的三个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6),57-65.
- 汪凤炎,郑红.(2013).论责任心的类型与层级.《心理学探新》,33(6),483-488.
- 杨中芳.(2001).《如何理解中国人—文化与个人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 Anagarika, L. G. (1981).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I Ching: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New York: Wheelwright Press.
- Gaertner, S. L., Dovidio, J. F., Anastasio, P. A., Bachman, B. A., & Rust, M. C. (1993). 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Recategoriza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intergroup bias.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 4(1), 1-26.
- Tajfel, H., Billig, M. G., Bundy, R. P., & Flament, C. (1971). 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 149-178.
- Wang, F. - Y., Wang, R. - J., & Wang, Z. - D. (2019). The Taiji Model of Self.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1443. doi:10.3389/fpsyg.2019.01443.

How to Nurtur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Ancient China: A Large Self – Perspective

Zheng Hong¹, Wang Fengyan^{1,2}

(1.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2.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dentifying with Chinese culture is merely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it is neither a sufficient condition nor both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The formation of a large self,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 – development, the process of forming this sense is, in fact, the process of an individual's self evolving from a small self to a large self. Thus, based on the Taiji model of Confucian self, excessive indulgence in the small self, failing to grasp the bigger picture, is the main obstacle to an individual's expansion into a large self that represents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 can we break the deadlock?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side from “enhancing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great motherland”,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other effective methods to get rid of ego – attachment: (1) Enable individuals to change their cognitions, transcend ethnic identity, and achieve national identity; (2) cultivating patriotism; and (3) elevating one's life realm.

Key words: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Small Self; Large Self; Taiji Model of Confucian Self